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什么问题

邢 贲 思

目前国内哲学界的同志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也都想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宣传的现状都不满意，都想进行一番改革、创新。有的同志着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结构方面进行探索，想从这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有的同志则注重用某些新的科学知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无疑都是有益的尝试，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究竟面临什么问题，然后才谈得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符合时代的要求，更替现时代的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谈得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面临什么问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相当困难，因为情况很复杂。限于水平和知识，我只是提出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可能很不全面，只限于国外的一些情况。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我们哲学界同志的共同努力。

就国外的情况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至少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面临西方哲学社会思潮的挑战；二是面临当代自然科学新发展的挑战；三是面临西方经济、政治形势的挑战。

一、面临西方哲学社会思潮的挑战

应当说，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它

的哲学的怀疑、否定的思潮一直都是存在的，有的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有的表面同情、实际上反对，还有的甚至打着拥护的旗号，千方百计地加以歪曲。我认为那种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公开敌视态度的思潮并不可怕，因为它容易引起我们的警惕，倒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某种表面的同情、甚至假装引以为同道，而实际上通过各种方法来歪曲它，使它成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这样一种思潮，应当引起我们重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在这方面，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起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的某些经历，尤其应当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问题要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和披露谈起。在二十年代，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院设法复制了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存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遗著原稿，工作人员在辨认照片拷贝时发现了这个手稿。1927年苏联出版的《马恩文库》第三卷中发表了这个手稿，当时编者误认为这个手稿是《神圣家族》的准备著作。1929年该手稿又一次被收入苏联出版的《马恩全集》俄文第一版第三卷。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G. Lanclsgut）和迈耶尔（J. P. Mayer）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存的原稿，把这部手稿整理出版，编入《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第一卷，这个本子并不完整。同年，苏联的一位学者把这个手稿整理成完整的本子，用德文发表于《马恩全集》国际版（MEGA）第三卷 标题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稿》发表前后，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等人借机大造舆论。1931年，迈耶尔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的一部未发表的著作》的报道。随后，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又合写了《马克思早期著作对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意义》的长篇文章。接着，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H. Marcuse）发表了《关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材料一对新发表的马克思手稿的解释》一文。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人德曼

(H. Deman)则以《新发现的马克思》为题，撰写了一篇长文，把这种宣传推向高潮。从此以后，在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借《手稿》的重新发现为由，竭力抬高《手稿》、贬低马克思后来著作的潮流，这股潮流被称作“回到青年马克思去”。

在这股浪潮中，《手稿》的地位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朗兹胡特、迈耶尔等人把《手稿》称作“新的福音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新发表的手稿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达到了完善的高度。虽然从表面形式可以看出，手稿不是为发表而写的，而是表现出自己弄清问题的强烈特点，但是这份手稿毕竟是包括马克思思想的整个范围的唯一文献。”马尔库塞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同样不遗余力地抬高《手稿》的地位。他认为《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研究史上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这部手稿可能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最初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和朗兹胡特、迈耶尔、马尔库塞一样，德曼也是竭力夸大《手稿》的意义。他说：“这部著作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容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必然会促使马克思的许多追随者和反对者去检查自己的观点。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要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德曼在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必须作出判断，要么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不属于马克思主义，那就是说，存在着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用它来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很清楚，这股“回到青年马克思去”的潮流的要害，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

三十年代初由《手稿》的披露而掀起的那阵喧嚣，不久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暂时中断了。但是战后没有多久，这股

潮流又卷土重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科伦版于1950年出版了。存在主义者、神学家梯尔（E. Tier）以《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为题，写了一个很长的评注，他通过把《手稿》归结为人本主义，又把人本主义说成是贯穿全部马克思著作的核心这种手法，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的原文使人无需较晚期著作的帮助，就可以对马克思本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有第一个有根据的观念。”又说：“没有《手稿》所提供的那个指导线索，就根本不可能理解较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线索就是：“马克思在制定他的洞察自然界，社会和历史的创造终极目的的世界观的时候，把人及其生活意义即哲学的社会学的人本学提到中心的地位”。除了梯尔以外，天主教神学家比果（P. Bigo）、新托玛斯主义的哲学家加尔维（J. Y. Calvez）、新托玛斯主义代表马利旦（J. Maritain）等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也都竭力利用《手稿》，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我认为这是一股很值得注意的潮流，因为这股潮流历时很久，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直存在，直到现在它的影响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不仅如此，它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是打着“重新发现马克思”、“重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以一种探求真理的面貌出现的，因而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此外，还要考虑到这样一种背景，即人道主义是一种国际思潮，这种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泛滥一时，反映了人们在一次大的灾难（如战争）之后的一种历史心态，这种心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用暴力（包括战争和其他暴力）解决人际关系。战后的许多哲学、社会学流派和思潮都打上人道主义印记，从这里不难找出它的答案。从三十年代开始的利用《手稿》的发现而掀起的那股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浪潮，在战后非但没有终结，反而愈演愈烈，从这里也不难找出它的答案。由于在我国出现过“文化大革

命”这种灾难性的事变，我国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也存在过或仍然存在着战后一些国家的群众所具有的那种反暴力的历史心态，因而国际上的各种人道主义的思潮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在我国国内会引起某种共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相当复杂，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自由讨论，我在这里也不想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但是，应当指出，利用《手稿》大作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同所谓“重新发现的马克思”、“重新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不相容的，是违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的本意的，是恩格斯或列宁强加给马克思的，这一切说法统统是错误的，是向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挑战。而对这种挑战，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保持沉默，而是应当应战。当然这种应战应当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能采取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

以上说的是来自西方思潮的一个方面的挑战。

来自西方思潮的第二个方面的挑战，就是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批判哲学，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以“新马克思主义”为标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盛行，这种思潮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它竭力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哲学的界限，尽量寻找它们之间的所谓“结合点”，用以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相当多，观点也相当复杂。它们之间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批判”还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还是反人道主义；真正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还是晚期著作，还是前后连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还是反动等

等。但它们又有共同点，这就是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不完善，或者已过时，需要加以改造，改造的途径就是使它同另一种哲学相结合（Complex），实际上就是要以一种资产阶级的哲学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

下面分别说明几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1 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或者说企图用弗洛伊德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张这种观点的有奥地利的赖希（W. Reich），还有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E. Fromm）。正是弗洛姆提出要实现一种所谓“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为了便于了解这种观点，有必要对弗洛伊德主义作一简要分析。弗洛伊德（S. Freud）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医生，是心理学中影响很大的精神分析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在早期著作中，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包含两个主要部分：意识的部分和无意识的部分。意识部分小而不重要，只代表整个人格的外表方面，而广阔有力的无意识部分则包含着隐藏的种种力量，这种力量乃是在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此外，弗洛伊德还主张前意识或下意识的存在。与无意识中的事件不同，前意识或下意识中的事件没有受到强烈的压制，所以它容易被召唤到觉醒的意识中。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重心理器官结构的学说。本我相当于他前期所说的无意识，这是最原始的、人格中最难接近的部分。这个极其强有力的本我包括人类本能的性的内驱力和被压抑的习惯倾向。弗洛伊德说：“我们把它叫做一团混沌、一口充满沸腾的激动的大锅。”本我不知道价值判断，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邪恶的，也不知道什么是道德。由于本我不考虑客观现实的环境，而只追求直接满足，所以它只根据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原则而操作。人的基本心理能或里比多（Libido）被围困在本我中，并且是通过减少紧张状态的意向

而表现出来的。例如，一个饥饿的人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作相当的运动去寻找食物，以便解除因饥饿而引起的紧张状态。自我和本我形成鲜明对照。本我只是盲目地有所渴求，不知道现实的情况，自我则知道现实情况。自我充当自身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仲裁者，通过理性和合乎理性的判断，并参考现实来调节本我。因此自我是按照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原则进行操作。自我不能脱离本我单独存在，它是从本我得到力量的。弗洛伊德把自我和本我的关系比作骑士和马的关系。马提供能量，而骑士则指导马的能量朝着他想去游历的路途前进。至于超我，弗洛伊德认为它代表着“一种道德的限制，代表着一个力求完善的维护者。总之，正如我们已经能在心理学上所了解的那样，超我被描述为人类生活的高级方向”。弗洛伊德的学说还包含许多别的内容，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尽管对人的心理结构似乎作了不同层次的分析，但其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他根本不谈人的心理活动对大脑的依赖性。而离开大脑来研究心理活动的本质，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此外，他过份强调本能、性欲在心理活动中的作用，使他的学说带上一层“泛性论”的色彩，虽很新奇，但也缺乏充分的科学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至今在西方仍很有影响，他之后，还有以荣格、阿德勒、霍尔妮、沙利文等人为代表的新弗洛伊德主义的诞生。

弗洛姆既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又是新弗洛伊德主义中的一个中坚分子。他二十年代就从事心理分析，移居美国后，与霍尔妮一道创立了美国新弗洛伊德学会。他认为，弗洛伊德片面强调无意识的本能对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没有考虑经济因素对人的个性发展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存在着另一种片面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把人看作是理性的生物，而没有看到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有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在起作用。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过份强调政

治、经济的因素，而完全忽视心理因素。因此他主张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实行一种“马克思——弗洛伊德综合”（Marx—Freudian Complex）。他说：“我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仍然保存的真理，而排除那些需要修改的原理。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也试图同样这么作。最后，我力图得出一种综合物，从对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解和批判中是应当得出这种综合物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2 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或者说企图用存在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张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J.P.Sartre）。

萨特的哲学观点内容很复杂，但可以概括为几点：第一，他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这就是：“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这个命题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演变而来的。海德格尔认为，一切理性主义的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兹一直到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存在之被遗忘”（Seinsvergessenheit）。意思是说，这些哲学都把重点放在研究宇宙的本质，而不去研究存在本身。萨特就套用这个说法，得出“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的命题，在他看来，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人的存在。他说：“首先是人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假如说，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是不可能给予定义的话，这是因为人之初是空无所有；只在后来人可变成某种东西，于是人就照自己的意志而造成他自身”。（《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认为，人就是当他被抛入这个世界以后按照自己的志愿自我造就的一种东西，人是一种把自己推向将来的存在物。第二，他提出一个独特的哲学概念“呕吐”或译“恶心”（La Nausée）。这个概念来自他1938年写的一本小说，这本小说的名称就叫“呕吐”。这个概念指的是人对存在的一种体验。他认为，一个人在经历了

种大的灾难或突然变故（为战争、自然灾害、疾病、亲人死亡等）以后，会突然感到孤寂、苦闷甚至绝望。在这种情况下，人把自己暴露给自己，看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所依恃，没有救助，背负着沉重的孤寂，经受着精神的炼狱。萨特的小说《呕吐》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洛根丁在一个小城市里和同他离别四年的情人会面，及至相见后，感到他的情人在外貌上和精神上已大非昔比，两人终于分手，于是洛根丁陷入一种孤寂、苦闷、绝望的心境，他发现原来人的存在就是这么一种存在。所以“呕吐”这个概念集中反映了存在主义的悲观主义的实质。第三，萨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关于“自由”的概念。萨特所说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而且是没有其他附加成分的。萨特认为，人的自由最重要的表现在选择中，真正的自由实质上就是选择的自由。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选择的过程，通过选择，人自己造就了自己。萨特的这种自由观在西方有很大影响，在我国青年中也有一定的影响，许多“人的价值就在于自我选择”的论调就来源于此。萨特的哲学当然不止这些内容，但以上几点是其核心。萨特的哲学之所以被称作“新人道主义”，也是以此为主要依据的。

萨特曾经对马克思主义表示过一定的好感，但后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重视人，只有通过存在主义对它加以改造，才能克服它的这一根本特点。他说：“马克思主义在象月亮吸引潮汐一样地吸引了我们之后，在改变了我们的全部思想以后，在清算了我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范畴之后，它突然把我们丢弃了；它没有满足我们对理解的需要；……它再没有一点新的东西来教育我们了，因为它自己已经停滞了”。又说：“马克思主义为不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而重新纳入自身之中，那么，它就将变质为一种非人的‘人学’。”他讲到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可以起到“改进”作用时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排斥”，

“这才需要在知识的历史总汇之外再生出存在主义思想来”。他提出要由“存在主义从同样的材料、同样的知识出发来作历史的辩证法的分析”，因为“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注意的是同一个对象，但是后者把人吞没在观念里，而前者则在凡是人所在的地方——在他的劳动中，在他的家里，在马路上，到处去寻找人”。（俱见《对于一种方法的探求》）萨特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排斥人，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没有把人放在自己的视野之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是社会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和萨特所说的人就是人的自我选择、就是人的自我造就的观点当然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这两种关于人的观点建立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的基础上。因此，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排斥人，而是萨特要以他的关于人的唯心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变质为存在主义。

3 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结构主义结合起来，或者说企图用结构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张这种观点的有法国的阿尔都塞（L. Althusser）。

为了说明这种观点，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结构主义的基本内容。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最初在语言学方面出现。1916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出版了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同十九世纪“历时态”语言学相对立，索绪尔提出“同时态”语言学。前者着重研究各主要语种的某些语言现象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而后者则主张作“统一语言体系”的研究，即着重研究同一时间内各种语言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因为在索绪尔看来，各种语言现象都是在一定时期内同时并存、相互制约、自成一体的独立的符号系统。第二次大战后，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把索绪尔的同时态语言学方法应用到人类学

研究中去，企图根据一些神话、传统和其他史前资料，通过对原始的、半开化的人的思想过程的研究，去发现人类心智的结构原型，发现当前的民族、文学、政治、法律等等的基础结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将神话故事的表面情节理解为某种“密码”，通过对这种“密码”的安排法则的分析，揭示出在“密码”背后深层起作用的“架构”（*frame work*）。这种“密码”和“架构”的关系，即神话与有关民族的文化结构的关系，也就是一种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关系。这一观点对阿尔都塞有相当的影响。以福柯（*M. Foucault*）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则把结构主义应用到历史、特别是科学史的研究中去。从以上简述中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的特征是强调同时态，强调横断面，强调整体结构。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要实现“结构——超结构综合体”（*Structure—Superstructure Complex*）。他的意思是，结构和超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超决定”（*Overdetermination*），才具有决定作用。他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过分夸大经济基础即所谓结构的作用，而对上层建筑即所谓超结构的变革能动性注意不够，他要从“综合整体”的观点来予以纠正。这很明显是想用结构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的历史决定论的观点。

阿尔都塞还把结构主义的原则应用于马克思著作的研究中。他提出“理论框架”的概念，什么是“理论框架”，这就是使得一种理论能够以特定方式提出某些问题而排斥另一些问题被提出的一种潜在结构。一种学说的理论框架，就是指这一学说的各种基本概念处于彼此的关系之中，并通过它们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和功能，显示出每个概念的本质，这样赋予每个概念以特殊意义。由于理论框架是一种埋藏在一种学说中的无意识结构，并且

往往是矛盾的、复杂的，因此，在读一种理论著作（包括马克思的著作）时，不能从文字上作简单的直接的阅读，而是要去发现埋藏在原文中的无意识的理论框架的许多症候，才能真正理解它。他的代表作《阅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资本论》的。

除了以上几种把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哲学或其他学说结合的观点以外，还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新实证主义结合起来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G. Della—Volpe*）和科莱蒂（*L. Colletti*），以及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韦伯（*M. Weber*）的社会学结合起来的哈贝马斯（*J. Habermas*）。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上述的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而且是以创造性的面貌出现，似乎表示了某种“改进”马克思主义的真诚，因此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比起“回到青年马克思去”这股思潮来，它是向马克思主义更加严重的挑战。需要认真对待。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上述两大西方思潮外，从六十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必将被超越的思潮。比起“回到青年马克思去”和形形色色的把马克思主义同别的哲学结合的思潮来，这是一股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1969年在弗顿堡出版的一本叫做《超越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的贡献）》的书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这本书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今天正经受着根本的危机”。1983年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封致马克思的公开信，作者为内格特，他向马克思本人宣布：“历史的进程同你的预见悖逆”，“你的理论尽管掌握群众，却没有变成实践的力量”。他提出，只有使马克思主义面向现实，面向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至于象法国的所谓“新哲学”，更是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露骨的敌视态度。“新哲学”的代表人物在六十年代是学生，有的人参加过“五月风暴”，戴过红袖章，自称是“最革命的战士”。“五月风暴”的失败以及法国和整个西欧形势的向右逆转，这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狂热的极左立场转向了疯狂的极右立场。其中象列维（Bernard Henry Levy）、格鲁克斯曼（A. Gluksmann）等人，在一些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肆意谩骂、恶毒攻击。列维的《人面兽心》，格鲁克斯曼的《女厨师与食人者》以及《大思想家》，污蔑马克思主义“是尼采式的权力意志论”，是所谓“警察的国家科学”，胡说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两大宗教：基督教会和马克思主义教会，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鸦片”。这种向马克思主义的猖狂挑战，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利用当代世界出现的某些新现象同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相违背，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宣称马克思主义存在危机和马克思主义必将被超越，甚至象“新哲学”那样宣布“马克思死了”，“社会主义死了”，这就是这股思潮的特征。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某些知识材料在新的实践和新的科学成果面前虽已显得陈旧，但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同样为大量的新经验、新成果所证实。至于那种别有用心恶毒攻击，除了暴露攻击者的反动立场外，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丝毫的损伤。

二、面临当代自然科学新发展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自然科学和技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时时在酝酿着新的突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一系列观念的变化，不仅向传统的自然科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挑

战。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作详尽的介绍，只能选择其中若干问题进行粗略的分析。

1、耗散结构理论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的问题。

什么是耗散结构？耗散结构是指一个系统通过同外界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其内部各原素之间产生非线性相互作用，克服自身内部的混乱，形成稳定的有序结构。

耗散结构是本世纪初贝纳德 (Benard) 所发现的一种物理现象。从下面给一杯静止液体加热，液体不断从杯底下吸取热量，又不断从表面放出热量，形成一个非孤立系统。受热液体会产生一个温度梯度。当温度差小于某一特征值时，热量通过热传导方式输送，液体从宏观上看去是静止的。当温度差超过某一特征值时，液体的定态失稳，突然出现许多规则的六角形对流花纹，在花纹的中心，液体向上流动，在六角形花纹的边缘，液体向下流动，形成“贝纳德花纹”。这时热量的输送主要靠这种宏观的对流。贝纳德花纹是一种有序结构，它不同于平衡态时的结构，是一种耗散结构。由于耗散结构现象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中广泛存在，因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耗散结构理论可以成功地说明生命现象，更引起生物学家的密切关注。比利时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 (I. Prigogine) 由于创立了耗散结构理论，并在化学上得到应用而获得197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金。

下面对耗散结构进一步作些说明。我们生活在宇宙中，我们所研究的宇宙的一部分，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与外界不发生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系统，我们称之为孤立系统；一类是与外界环境有能量交换而没有物质交换的系统，我们称之为封闭系统；还有一类是与外界环境既有能量交换又有物质交换的系统，我们称之为开放系统。十九世纪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研究的是孤立系统，而且一直局限于研究平衡态，很少接触非平衡态。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主要研究的是接近平衡的状态。只有

到了六十年代，科学家们才把非平衡态理论的研究推向了非线性和远离平衡的领域。普里高津等人通过研究发现，一个开放系统（不管是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还是生物的系统），在达到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时，一旦系统的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域值，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到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的新的状态。这种有序状态需要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才能维持，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因外界的微小扰动而消失。普里高津把这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称之为耗散结构。这种自行产生的组织性和相干性被称作自组织现象，用这种概念来理解贝纳德花纹，这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系统远离平衡而“自己组织起来”的一种过程。运用这种理论，生命现象也能得到理解。生物体作为具体的体系，其生长、发育、生命的维持和进化都只能在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条件下实现。通过这种交换，生命才能同自身不断产生的混乱作斗争，因此，生命是一个自组织过程，也就是一种耗散结构。运用耗散结构理论研究生命现象，寻求它的热力学和统计力学方面的物理基础，发展出一门新的热力学——生命热力学。

耗散结构理论在哲学上提出了什么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呢？这种理论指出，远离平衡系统之所以会出现失稳以至形成新的结构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依赖非线性的反常涨落，这种涨落来源于系统本身的分子结构。在平衡态附近所有的涨落都是衰减的，涨落只起很小的表面作用。但在远离平衡时，在不稳点附近涨落有很大的反常，最初是小范围内产生，最后在大范围中出现，最后出现了崭新的结构——耗散结构。由于随机的涨落在耗散结构形成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耗散结构受到内部和外部扰动的影响，从而使得这些结构总是以各种不可预言的方式变化。由于事件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受涨落影

响，所以就带来了未来历史发展的非严格决定论。普里高津认为，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象拉普拉斯那样的预言是不可能的。拉普拉斯认为，未来已经包含在过去的条件之中，一切都是给定了的，对任何事件从理论上都可以作出决定性的预言。普里高津称之为神话。他在自己的理论中虽没有完全排斥决定论，但很强调概率因素的重要性。由于他在历史观上特别重视涨落和随机因素，因此使他得出和拉普拉斯的机械决定论相反的结论。应当说，耗散结构理论的出现自然科学上是一个突破，它对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有人利用它的强调随机因素、强调线性相互作用、反对机械论而提出一种观点，似乎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决定论都是错误的，同时似乎传统的关于线性因果联系的观念、强调事物发展中纵向联系观念也都是错误的。按照这种说法，不但机械决定论要不得，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也要不得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统统推翻了。这是利用某种新的自然科学的观点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种挑战。

② 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这场革命的特征之一就是电子计算机作为手段使得人的智能得到扩大和延伸。所以它实质上是一场知识革命。知识革命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有其内在根源，这就是知识爆炸。在知识爆炸的情况下，不仅单凭人的脑力难以处理，即使一般的计算机也难以胜任。一个大型的软件工程，有时需要几千人年才能完成，产生了软件危机。这种危机导致计算机本身的变革，要求计算机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进行改进，使之成为真正的智力放大器。当计算机不仅具有数据处理和信息处理的功能，而且具有知识处理的功

能，计算机也就演变成成为智能机，工业社会的自动化就进入了信息社会的智能化。第五代计算机如果制成，就是一种智能机。日本从1982年开始研制，预计九十年代可以成功。这是一个面向知识信息处理的计算机系统，日本人称之为 KIPS (Knowled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也就是知识信息处理系统。这个系统主要具有问题求解和推理的功能、智能库管理的功能和智能接口的功能。机器智能是对人的智能的模拟，怎样使机器象人那样，特别是象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那样获取知识和使用知识，做专家能做的事，便是知识工程 (Intellectual Engineering) 的任务。

知识工程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它是由美国人工智能专家费根鲍姆 (E. A. Feige Nbaum) 于1977年在第五届国际人工智能会议上提出的。它运用人工智能的原理与方法，为那些需要专家知识才能解决的应用难题提供求解的手段。恰当地运用专家知识的获取、表达和推理过程的构成与解释，是设计以知识为基础的系统的重要技术问题。这类系统就是通过智能软件建立的专家系统。有关专家系统的理论、技术、设计和实施的研究，统称为知识工程。在知识工程中，知识表达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关键。所谓知识表达，就是用一种计算机可解释的人工语言来精确地表示非数学的知识，包括专门知识和常识性知识，以便机器能对知识进行处理，得出有用的结果。

知识工程既来源于建造专家系统的实践，又指导专家系统的建造。最早的专家系统是斯坦福大学于1965年研制的 Dendral 系统，通过质谱数据能够识别化合物的分子结构式，达到化学博士水平。斯坦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于1978年研制的地质勘探专家系统 Prospector对华盛顿州某钼矿进行预测，结果被完全证实。1980年，费根鲍姆和布坝南 (Bruce G. Buchanan) 等人发挥知识工程作用，研制出大型的专家咨询系统 HPP/80，使专家系统